



延安时期桥儿沟乡镇的黑板报

□ 郭玉杰



群众阅读黑板报

解放日报对延安黑板报的相关报道

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推动下，《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关中报》《米脂报》《延市通讯》《安塞群众》等众多报刊都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收到了很好的新闻宣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各乡镇纷纷创办黑板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据资料显示，当时仅绥德地区的葭县在1944年下半年就创办黑板报67块。黑板报由于贴近群众生活“接地气”，而且适应战争形势下根据地经济困难的环境，成本较低便利可行、适应基层办报能力，所以尤受群众欢迎，其中延安桥儿沟乡镇的黑板报在宣传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成为发动群众参与办黑板报的典型。

延安时期的桥儿沟乡镇包括一条市街和五个自然村，全乡151户人家，共562人。其中认识千字及千字以上的有34人，认识500到1000字的也有二三十人。全乡人口比较集中，除一个离开市街有六七里路的刘家沟外，其余四个村子都分布在市街的周围；市街成为全乡一切活动的中心，乡上的黑板报就竖立在市街的丁字路口上。黑板报由木板制成，宽约1.3米，长约2米，镶在木架上，方便雨天移动。

桥儿沟乡镇的黑板报从1944年6月办起，以7月底为界分成两个阶段。7月底以前由乡政府文书主办，7月底以后黑板报的编辑、写稿则交给群众负责，乡政府进行领导并给予帮助。当时初步规定黑板报三天出一期，稿子多了可多出。

乡政府最初办黑板报时，干部的热情不高，群众的态度也较冷淡。因为早在1942年时乡上曾经出过黑板报，报名叫“街头新闻”，由鲁艺俱乐部主办。每天由一个负责人将《解放日报》上的国内外重要消息摘录一些抄在黑板报上，群众能够看懂的很少，对它不感兴趣，这使办黑板报起步艰难。

后来在乡政府和部分干部的支持下，于1944年6月5日出了第一期。群众对第一期黑板报的反映还不坏，对黑板报上的消息都感到新奇。紧接着又出了第二期，报道了《十二岁的娃娃顶大人》，表扬一个娃娃热爱劳动的事情。群众反响不错。

这样黑板报就逐步办了起来，但也伴随着许多困难。这一时期发动群众参与的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黑板报的内容主要配合政府工作的开展，反映乡上的情形，如变工队、妇纺、卫生、识字以及反对巫神等。有时也登载一些时事消息，但由于稿子长，文字不通俗，群众很难接受，对办黑板报的热情不高。

桥儿沟乡政府积极征求群众意见，很快便认识到了办黑板报脱离群众的问题，于是在7月底提出“大家办，大家看”的办报原则，发动群众给黑板报写稿，并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群众给黑板报写稿或提供材料的多了起来。1944年8月，乡政府把全乡的文化工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文化委员会，由乡政府负责领导，把黑板报交给文化委员会来办。当时全乡除一个小村子赵家崖外，每个村子都分布有文委会的委员。每个委员都担负通讯员的工作，同时发动和指导群众写稿，群众不会写字的就由委员代笔。这段时期，群众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稿子多得登不完，有些稿件黑板报还寄往《延市通讯》《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

经过不断调整和改进，黑板报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含时事、妇纺、卫生、表扬、批评、政令等内容，文字口语化，群众喜闻乐见；二是反映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群众感到亲切；三是形式更加活泼，配有插图、画像，对群众有吸引力等。因此，黑板报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反映群众生活、推动乡镇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乡镇工作。群众发现一些问题，很快把它反映到黑板报上，

推动了乡上的工作。如街上一个妇女写了一篇表扬杨老婆生产积极的稿子：杨老婆今年50岁了，在半年中间纺了24斤线子，还协同儿子做了好几石豆子的豆腐。经过乡干部的考察，杨老婆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妇女。黑板报上表扬了她的事迹，对乡上的生产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教育和引导群众。一方面传达政策和信息，由识字的人读给群众听，使群众能够便捷地了解政策和时事，获得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发挥激励作用，当时群众把做好事登黑板报表扬的叫“上黑板报”；做坏事受黑板报批评的叫“爬黑板报”。“上黑板报”和“爬黑板报”已成为桥儿沟乡镇老百姓中的口头话，也成为老百姓学榜样和对照检查自己的一面镜子。有谁吵架或是不文明的现象出现，只要登上黑板报立即马会改正。

群众识字的工具。黑板报的编辑由夜校的教员和学生担任，由此使黑板报和夜校联系起来。商会夜校主动给群众提供老师教授识字，还将一些投稿群众发展成夜校学生。同时，为给黑板报写稿，表达思想或反映情况，也提高了群众学习识字写字的积极性。

黑板报对党报传播效力发挥了补充作用，同时也使党的政治影响力向基层延伸。1945年的《解放日报》多次刊发边区群众办黑板报深受好评的报道。黑板报一头连接着党和政府，一头连接着群众，不仅向基层传播党的声音，助推基层政府的工作，而且有利于培养新公民的素质，淳化民风，推进乡风文明。延安时期桥儿沟乡镇的黑板报就是党领导下大众办黑板报的一个缩影，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实践探索。



宋代理财能臣蒋贻

□ 龚齐珍 郑连生

变”。朝廷派陕西抚副使田况前往保州平叛。广信军在保州北边，与保州是近邻。蒋贻在参与平叛中结识了田况，并受到田况的信任，田况对蒋贻的理财之能颇为赏识。

蒋贻的职务是通判，负责管理当地的财政，包括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事项，“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此外还负责将当地官吏政绩好坏上报朝廷的职责。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蒋贻成为同科进士欧阳修的部下。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将河北的贡赋物产通过漕运转运到京师。当时，河北御河漕运不通，问题出在漕船上。因为，河北漕船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存在许多弊端：负责造船的官吏假公济私，弄虚作假，从中渔利；造出的船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就要大修甚至报废；负责漕运的丁在运输的过程中夹带私货，使漕船不堪重负，损坏更快。资性明敏的蒋贻看到了问题实质，认识到要疏通漕运，必先解决漕船问题。蒋贻是江南人，知道江南的造船业发达，造船技术远胜于河北。于

是，他派人到江南招募造船技师，仿照江南造船工艺，结合河北当地的实际设计、监造出一种较北方漕船更为阔大、坚固、适用的锁袱船。

第一艘锁袱船经过试用，效果不错。是时，欧阳修正准备向朝廷请旨恢复御河漕运和建造新船，得知蒋贻已造出新船十分高兴，他经过实地考察和精确计算，认为锁袱船“人工物料比旧减省，而可以兴行漕运之利，杜绝侵欺之奸，宜取其法行之”。于是，欧阳修向朝廷上书，要求朝廷推广蒋贻监造的锁袱船“以兴行漕运之利”。此后，锁袱船得到推广。河北路由于推广锁袱船，御河漕运得以疏通，漕船的建造成本得以减半，官吏监造漕船从中渔利的现象得到扼制，蒋贻也因此开始得到朝廷的重用。

关心民瘼，不避权贵。由于蒋贻在广信军的政绩突出，不久就被朝廷擢升为夔州路转运使。夔州路治所在今重庆奉节，时管辖十州、三军、一监、三十二县。蒋贻除了掌管这一地区的财政外，还要负责监察州、军、县官吏。夔州路以山地为主，土地贫瘠，出产井盐。北宋政府为了解决陕西等边关地区的军需粮草问题，采取

“给券受盐”或“折盐酒岁课”的“入中”之策。“入中”，简言之就是“入中钱币”，即朝廷先用钞引支付盐酒等所需物资，然后，商人再持钞引到京城的官吏和商人串通，将其所入之物虚估，任意抬高价格，使得陕西边关之地盐价下跌，“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这样一来，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大获其利，而并盐产地夔州路地方官府和当地百姓大受其害。蒋贻对这种“入中”之策的弊端十分清楚，经过实地考察和精确计算之后，他给朝廷上疏：“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值二十余万缗，今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朝廷下诏认可了蒋贻的建议，准许夔盐不再入中折偿，仍然按入中以前的政策实行。蒋贻建议被采纳后，大大减轻了全路百姓的负担，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皇祐元年（1049年），由于时任三司使的田况举荐，蒋贻由地方调到朝廷，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北宋为了加

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三司使。三司包括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的地位相当于副相。度支为三司之一，负责管理全国财政。度支判官是专门管理财务支出和预算的重要官员。当时，朝廷为保西北边防，军费增加，而同时由于官僚机构庞大，支出成倍增加，财政入不敷出。尤其是朝廷给宗室子弟召集到京城奉养，皇帝赐给宗室贵族“高爵厚禄”，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负担。据史料记载，这批皇族显贵的支出比景德年间增加了几倍，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蒋贻将实情禀报田况，并剖析源流，晓以利害，“与（田）况议出入之数”。田况综合了蒋贻的意见，作《皇祐会计录》上报皇帝，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理财能臣，公平无私。《皇祐会计录》的上报，触犯了皇族宗室子弟的利益，导致这些显贵们对蒋贻不满。皇祐二年（1050年），蒋贻在度支判官任上只做了一年，就被挤出了朝廷，外调为河北路转运使。河北路管辖七府、二十州、十一军、一百二十二县，是京师重要的财政来源及北部驻军的物资供应地，这使善于理财的蒋贻更有用武之地。河北与辽国接

亲子三题

□ 曾业松



2022年7月11日，母亲走了，享年87岁。

母亲一生历经战争年代的苦难、建设时期的苦劳和社会变革的苦劳。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虽然平淡平凡，但宽容谦让、与人为善，受人尊敬。对我们做子女的来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人间最苦，莫如爹娘！

母亲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她却用无数细微的小事，体现大爱和美德，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我觉得这比太阳更光辉，比黄金更珍贵，让我们终身受教受益。这里谨记二三。

（一）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安徽农村出现的饥饿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时候，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口粮艰难度日。尽管如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时常发生。特别是春天闹饥荒，家里人也不得不去挖野菜充饥。有一次，我吃野菜中毒，肚子胀气，放在地上躺了两天，才慢慢缓过来。

记得1960年春的一天，母亲不知从哪儿捡到几粒黄豆，放在野菜锅里。豆子煮熟了裹在菜里找不到，盛野菜给我吃时只找到三粒。她后来一直为此事感到内疚，总是念叨该吃的没有吃上，抱怨那几粒豆子不知道给谁吃了。三粒黄豆蕴含的母爱是我一生最深刻的感受。我曾经把这个故事说给读小学的儿子听，没有想到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把老师都感动得哭了。可见母爱的力量浸透肺腑，撼动魂魄。

（二）

1964年，我从父母居住地的小学，转到爷爷家所在的杨村小学读书。两地相隔15里地，没有公路，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迈开两脚走路。那时家乡的路都是羊肠小道，对一个10岁的小学生来说，单独走这么远的陌生小路是有风险的，所以大人们也都放心不下，每当开学时都由父母送我到爷爷家，放假时爷爷再把我送回到父母身边。印象中母亲送我的次数是最多的。

开始，母亲全程护送我。走累了，就让我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从第二趟起，母亲边走边跟我说，这条路上有多少弯，转弯的地方有什么标志，走到岔路口不知道怎么走，可以到路边的人家去询问。还跟我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次数多了，路就熟了。第三趟时，她把我送到临近杨村的地方，要我胆子大点儿，自己走到爷爷家。等我到爷爷家门口时，发现母亲就在后面一直跟着。原来她对我一个人走路还是有点担心，直到看见我安全到达，才放下心来。再到第四趟送我时，只送一半

路程就让我一个人单独走。就这样，母亲一次次护送我，慢慢引导我独立出行。由此，我常常体会母亲当时的良苦用心，千方百计培养我的独立能力，同时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让我领悟，人生的道路最终要靠自己去探索。

（三）

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过得好不好，关键在于一个“学”字。“学好杨六郎，学不好卖麻糖”，向我灌输一种价值追求：读书好，有作为，可以保家卫国；学不好，没有什么出息，但也要有能力养家糊口。母亲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无论如何都要掌握一些谋生本事。具体说，就是要学一些工匠活，保证自己能碗吃饭。“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停课，学生上不了学，社会上流传“读书无用论”。但我还是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向别人借了一些初中课本，在家自学。父母说，书本要读，农活也要干。一方面要我到生产队干农活，挣点工分，一方面要我去学点手艺。

先是学理发，这个简单，技术要求不高，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去县城学瓦工，这个体力活较重。母亲说，儿子个头小，不适合。于是要我学做面点糕点，烧饼、油条学会做了，麻花、月饼、江米条也能做了，接着去制作挂面。这些都是很实用的，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成家后做饭做菜从来不发怵。

再到后来，母亲要我跟她学做缝纫，大概是还想培养我做男性缝纫师。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里第一批到扬州接受缝纫培训的学生，技术水平还是被大家认同的。在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下，一般的缝纫活儿都实践了。“线走直，脚压平”的要领大多能够掌握，“裤子不上腰，一天七八条”也能做到。虽然那时我没有学到家，也未如愿成为裁缝，但后来遇到缝缝补补的事，倒也不发愁。

母亲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留给我们的都是对儿女慈爱关爱的深情，为了儿女的成长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的品行。追思母亲的过往，最难忘的就是她那无私的母爱，一桩桩一件件都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母亲走了，母爱永恒。恩情多深，思念多长。我们以有这样的母亲为荣！如果真的有来生，也愿做她的儿子，报答她哺育儿女的大恩、呵护子女的大爱。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蒋贻（1006—1078年），字国华，号文菴，北宋吉州龙泉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人。他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天圣八年（1030年），蒋贻和北宋文坛首领欧阳修、名相刘沆同登进士第，为宋代龙泉县的第一个进士。他先后担任广信军通判、夔州路转运使、三司度支判官、河北转运使、三司盐铁判官和掌全国财政的三司度支使。作为北宋著名的理财能臣，蒋贻的许多治国理财事迹记载在史料中，被后人称颂。

建造新船，疏通漕运。北宋中期官僚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军队数量有增无减，战斗力却不强，由此导致冗官、冗兵、冗费严重，国家贫弱。同时，北部的辽和西夏威胁着北宋的安全，北宋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改变现状，挽救宋朝统治危机，庆历三年（1043年），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当时，担任广信军通判的蒋贻和朝廷的有识之士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起支持新政。蒋贻在当地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经济，澄清吏治。虽然由于大官僚的反对，新政以失败告终，但蒋贻的理财能力已崭露头角。

广信军隶属于河北路，是抵御契丹的边关重地。杨家将抗辽的遂城关就在广信军辖内，当地“人性质厚少文，多专技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枝。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当时，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贪官横行，官商勾结，民不聊生，爆发了云翼军杀死州吏，占据州城的“保州兵

变”，“澶渊之盟”后，在河北路雄州、霸州开设了“榷场”，与辽进行通商贸易。蒋贻将通商贸易监管和经营得很有效，他除了监察府、州、军、县的官吏外，还承担出使辽国的使命。皇祐四年（1052年），朝廷任命蒋贻以“权盐铁判官，都官员外郎”衔作为正旦使出使辽国，蒋贻不辱使命，完成了出使任务。

蒋贻在河北路转运使任上干了7年，他品行端正，清正廉洁，其远见卓识和理财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嘉祐二年（1057年），蒋贻被朝廷“召为盐铁判官”，不久，他又被敕封为三司度支使。度支使“掌天下财政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此时蒋贻成为总管全国财政的朝廷重臣。皇帝称他“醇深庄重，公平无私，学问高明，有见识超越之能，艺足泛应，得因时转运之宜”。后来，蒋贻不喜朝廷官场习气，遂连续两次上疏，辞官告老还乡，还乡后创办书院，造福乡梓，得享高寿而终。

